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徐辉,吴程琳.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 CFPS2018 数据[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6):96-104.

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 CFPS2018 数据

徐辉^{1,2} 吴程琳²

(1.长江大学 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荆州 434023;2.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利用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通过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数,建立 Probit 模型系统分析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家庭创业,两者关系具有一定稳健性;普惠金融发展对存在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促进效果更显著;保险覆盖率的提高对风险厌恶型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电子支付使用度的提高对低学历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正规融资在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家庭创业间起中介作用。因此,政府应重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完善农村保险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家庭综合素质和正规金融质量,进一步激发农村创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

关键词:普惠金融;农村家庭创业;信贷约束

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 (2022)06—0096—09

一、引言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农村地区人才流失、老龄化及空心化等问题严重,农村家庭创业成为吸引人才回流、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农民就业、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之一。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创业的政策。早在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要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创业以促进农村发展。然而,创业具有长周期、高风险与不确定性的特点,导致创业融资存在非常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

信贷约束的问题,大部分创业都以失败告终^[1]。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创业离不开金融。创业需要持续稳定的资金来源、完善且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具体而言,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合理有效地分配金融资源、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地区创业活动。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推动下,打造广覆盖面、高融资效率、可持续性的普惠金融体系对农户来说尤其重要^[2]。2022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为下一阶段普惠金融发展明确方向和目标。近年来,在政策扶持下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卓越成效。在一些普惠金融发展较早的地区,部分农村家庭创业者已经体验到普惠金融的高效性和便利性,享受到普惠金融的发展红利。因此,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时期,在

收稿日期:2022-06-03

基金项目:湖北省重大调研课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问题研究”(J202109007)

第一作者简介:徐辉(1975—),男,湖北通山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

通信作者:吴程琳(1998—),女,湖北荆门人,主要从事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E-mail:158226026@qq.com。

农村创业风险高且成功率低的背景下,用新的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发展是否真的能促进农村家庭创业,阐明其中中介效应机制,成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对普惠金融发展和农村家庭创业的关系进行分析,结合已有文献提出假设并构建模型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促进作用显著,正规融资获得具有中介效应。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一是区别于其他学者,选取了 2018 年 CFPS 数据库,构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分析,具体考察了普惠金融的可获得性、使用便利性及使用有效性,丰富了相关研究证据。二是将构成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三个指标分别进行异质性分析,已有文献重点关注地区异质性及群体异质性等,本文重点关注了信贷约束、保险覆盖率以及电子支付使用度的异质性。三是在模型选择与构建中丰富了控制变量,已有文献大都重点关注个人特征变量与家庭特征变量,本文创新性加入了社区特征变量,以期丰富相关研究微观层面内容。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普惠金融和农村家庭创业

普惠金融联盟(AFI)等国际组织提出,普惠金融包含三个层次的含义,分别是可获得性、使用便利性、质量水平。纵观已有研究发现,早期的研究大多以宏观角度为主,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微观角度探究普惠金融与创业之间的关系,使得对于普惠金融的衡量有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因此,普惠金融可能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促进作用。

第一,普惠金融通过弥补传统金融对不发达地区的不足,使农村等不发达地区能够享受更多红利。目前我国城乡差距较大、失衡问题突出,城市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显著高于农村地区,农村地区家庭创业过程中信贷约束、非正规借贷问题严重。而农村地区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要阵地,“三农”问题更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张碧琼(2021)从城乡差异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揭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益贫性”特征,即无论是收入效应还是创业活动,农村居民均从中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红利^[3]。杜晓山(2006)指出普惠金融体系能够明显拓宽金融服务边界,助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

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

第二,普惠金融通过降低农村家庭创业成本,提高创业可能性。朱粤伟(2007)认为金融交易成本越高,金融交易就越难达成,金融交易效率和质量就越低^[5]。同时,在传统金融供给框架下,农村金融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在信贷过程中存在较高的显性和隐性交易成本。普惠金融的出现使得消费者可以在线上完成交易,改变了商业模式中价值交付的环节,同时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对分散的客户资源进行整合和管理,有助于降低人工物力等方面的交易成本,罗新雨等(2021)指出在普惠金融的推动下,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金融服务机构的获客成本、搜寻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同时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制度性创业的门槛^[6]。因此,普惠金融可能对农村家庭创业产生促进作用。

前文阐释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推动农村家庭创业活动的开展,而这种促进作用是通过弥补传统金融对不发达地区的不足、降低农村家庭创业成本来产生的。据此,提出假设 1:

H1:普惠金融发展有利于促进农村家庭创业。

(二)家庭普惠金融水平、信贷约束与家庭创业

资金是创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业行为能否持续进行,同时农村家庭的自有资产普遍较低,创业资金的获得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借贷。农村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的信贷约束与排挤,同时由于市场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这种约束和排挤将进一步被放大,导致创业受阻碍^[7]。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的影响与信贷约束有着密切联系,正规的金融机构通过对贷款用途的规定及贷款后的用途跟踪管理可以对创业农户的资金使用进行管理和监督,督促农户进行创业活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征信系统的完善,还款期限也可以激励创业农户,提高农户创业积极性与努力程度^[8]。当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时,农村家庭所面对的信贷约束越小,创业门槛相对降低,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在普惠金融的推动下,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金融服务机构的获客成本、搜寻信息成本、交易成本等,同时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和制度性创业的门槛^[6],使得更多的创业群体,尤其受到信贷约束较大的农村家庭能够接触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享受普惠金融福利。据此,提出假设 2:

H2:普惠金融发展对存在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创业的促进效果更显著。

(三)保险覆盖率、家庭风险偏好与农村家庭创业

不少研究表明,保险与家庭创业有着密切的联系。陈怡安等(2015)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研究发现社会保险的参与显著提高了个人的创业概率,平均促使个人创业概率提高 2.1~2.5 个百分点^[9]。有学者指出医疗保险的普及不仅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创业概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正向影响也更为显著^[10]。周德水等(2018)通过分析发现医疗保险通过缓解医疗费用支出来促进创业,养老保险则是通过降低金融风险投资概率对创业产生影响^[11]。尤其指出医疗保险对创业的“激励效应”主要在农村居民。可以推断,拥有商业保险对农村家庭创业起到促进作用。农村家庭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而购买商业保险,其赔付产生的替代收入可能影响家庭的未来储蓄和当期消费。家庭获得商业保险后,抵御健康或财产等风险的能力变强,会促进家庭的创业^[12]。对于风险厌恶型和风险偏好型两种农村家庭来说,风险偏好型家庭本就偏好风险,是否具有抵御风险能力的商业保险对其创业决策的影响相对较小。据此,提出假设 3:

H3:保险覆盖率对风险厌恶型农村家庭的家庭创业促进效果更显著。

(四)电子支付使用度、受教育水平与农村家庭创业

以网络支付为主体的第三方支付行业作为新兴金融服务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金融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首先,第三方支付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电子支付基础设施建设^[13],为创新创业提供了基础,互联网降低了顾客的搜寻成本、评估成本等^[14],促进农村淘宝、电子商务等产业的发展。其中农村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快速改变了农村家庭创业的生产及销售模式,农村创业者不仅可以通过产品信息实时动态来降低生产成本、灵活调整生产策略,还可以通过微信、直播等方式拓宽销售平台^[15]。其次,第三方支付的普及提高了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缓解农村创业家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农村创业家庭能够接触到更多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加速金融机构资金周转,缩短资金流动的时间,降低农村家庭创业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因此,第三方支付的发展可以缓解农村地区的金融排斥问题并促进农村家庭创新创业。由于在农村地区受教育水平的参差,信贷约束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家庭创业影响更大^[16],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收获信息的能力相对来说会更强,多年的求学

生活的经历经验使他们受到信贷约束与排挤的可能性会更小,他们可以通过第三方支付以外的更多方式寻求金融支持及获取信息。据此,提出假设 4:

H4:电子支付度对受教育水平低的农村家庭创业促进效果更显著。

(五)正规融资获得的中介效应

正规融资获得指的是是否能够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在农村地区,农村家庭的自有资产普遍较低,创业资金的获得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借贷。信贷融资问题成为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重要因素。正规融资的获得不仅蕴含着农村创业家庭资金的获得,同时意味着农村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正规融资的获得是农村家庭创业资金的重要来源,是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重要驱动因素。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农村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市场的信贷约束与排挤。相对于正规信贷,民间借贷、网络借贷等非正规信贷方式借贷风险大、利率高,还存在极大地不安全性,不利于促进农村家庭创业选择。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普惠金融向农村地区持续扩散,对缓解农村地区信息不对称性及农村家庭的信贷约束具有重要作用。普惠金融供给下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机构发展等要素潜力进一步激活,有助于农村地区创业家庭的正规融资的获得。而农村地区正规融资的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农村家庭创业的资金短缺问题,从而促进农村家庭的创业决策。据此,提出假设 5:

H5:普惠金融通过提升农村地区正规金融的获得,进而促进农村家庭创业,即正规金融获得在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数据选择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SSS)于 2018 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CFPS 样本覆盖 25 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为 16000 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中的全部家庭成员,本文选取其中农村户口样本 8719 户。CFPS 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采用计算机辅助调查技术开展访问,满足多样化设计需求,访问效率高,数据质量得以保证。

(二)指标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农村家庭创业。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农村家庭创

业,定义为农村家庭是否创业。具体定义创业的内涵是筛选农村户口样本询问“过去 12 个月,您家是否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若回答是肯定的,则“农村家庭创业”变量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样本总量为 8719 个,其中有从事个体私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有 878 户,占比约 10.07%。

2.解释变量

普惠金融。普惠金融的衡量,首先需要确定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普惠金融概念的多维性和综合性得到了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普惠金融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确保所有社会成员无障碍享受金融服务,强调平等性及有效性^[17],Sarma(2016)对普惠金融的研究从地理渗透性、服务可得性及使用有效性等三个角度来描述^[18]。参考张楠等(2018)的研究方法^[19],我们将可得性、渗透性和使用性分别用家庭在信贷可获得性、商业保险覆盖率、电子支付使用度三个方面进行表现。参考张正平等(2019)的做法^[7]将三个变量均处理为二元虚拟变量,对三个变量进行加总计算,以最终得分衡量家庭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

(1)家庭信贷可获得性。在本文中,信贷可得性指农村家庭在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贷的情况。在询问家庭的金融资产与债券债务时,提问该家庭借款被拒经历,回答曾被银行拒绝视为受到信贷约束,家庭信贷可获得性为 0,其余样本家庭视为没有受到信贷约束,家庭信贷可获得性为 1。将各个家庭的贷款可得性进行统计,得到家庭信贷可获得性水平。

(2)商业保险覆盖率。根据提问过去的 12 个月,家庭用于购买商业性保险(如商业医疗保险、汽车险、房屋财产险、商业人寿保险等)的支出是多少来判断商业保险的覆盖程度。过去 12 个月在商业保险上有支出的样本则商业保险覆盖率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电子支付使用度。2018 年 CFPS 涉及第三方金融服务的问题是“一般情况下,您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动(如使用网银、网上购物)的频率有多高? 1.几乎每天;2.一周 3~4 次;3.一周 1~2 次;4.一月 2~3 次;5.一月 1 次;6.几月 1 次;7.从不”,将使用频率在一周 1~2 次及以上的样本电子支付三方面金融服务使用度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3.控制变量

参考张勋等(2019)的做法^[20],本文将选择以反应样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社区特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

的平方)、受教育水平(受教育水平的平方)、健康状况、风险偏好;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规模、自有住宅、其他房产、家庭总收入、农业总收入。由于家庭创业决策不仅受自身禀赋的制约,还会受到社区内部其他成员的影响,综合考虑农村情况,即将农村家庭的人际交往年度支出、非正规信贷余额视为社区特征变量。

(三)模型选择

为了检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本文选择 Probit 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

$$\text{Prob}(\text{Entre}_i)=\alpha_0+\alpha_1z_i+\alpha_iX_i+\mu_i \tag{1}$$

其中, Entre_i 表示农村家庭是否从事自营工商业,取值为 1(创业)或 0(未创业); z_i 表示解释变量普惠金融指数; X_i 为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社区特征等;随机扰动项 μ_i 服从正态分布。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核心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在 8719 个农村户主样本中,家庭创业的均值为 0.1007,表明创业的农村家庭占比为 10.07%;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为 1.3510,其中信贷可获得性的均值为 0.9604,商业保险覆盖率的均值为 0.2770,电子支付使用度的均值为 0.1135,综合以上可以看出有 45.03%的农村家庭获得了信贷、商业保险以及电子支付的支持。其中,获得正规金融信贷的农村家庭占比达到 96.04%,拥有商业保险服务的农村家庭占比 27.70%,获得网络支付服务的农村家庭占比 11.35%。

2.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

表 3 中模型 1~4 给出了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模型 1 中引入被解释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模型 2~4 中依次引入了控制变量中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以及社区特征,最后得出各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 Probit 回归结果。

(1)核心变量的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 3 可知,在农村家庭的样本中,模型 1~4 中家庭普惠金融的系数均为正值,可以验证假设一,表明农村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家庭,创业的几率越大,这也意味着信贷可获得性、商业保险覆盖率以及电子支付使用度是农村家庭创业的重要影响因素。

表 1 关键变量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描述
被解释变量	家庭创业	<i>Entre</i>	农村家庭是否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是=1;否=0
解释变量	家庭普惠金融	<i>IFinance</i>	有可得性、覆盖率及使用度三个指标合成计算
控制变量	个人特征	性别	<i>Gender</i> 男性=1;女性=0
		年龄	<i>Age</i> 调查对象年龄,实际数值,单位:岁
		年龄平方	<i>Age²</i> 年龄的平方,考察其对创业影响的形状
		受教育水平	<i>Education</i> 调查对象的受教育年限,实际数值,单位:年
		受教育水平平方	<i>Education²</i> 受教育年限的平方,考察其对创业的形状
		健康状况	<i>Health</i> 身体状况,健康=2;一般=1;不好=0
		风险偏好	<i>Risk</i> 愿意承受高风险,风险偏好=1;否=0
		家庭规模	<i>Number</i> 家庭成员数,实际数值,单位:人
	家庭特征	自有住宅	<i>House</i> 自有住宅产权,有=1;否=0
		其他房产	<i>Property</i> 除自有住宅外拥有其他房产,有=1;否=0
		家庭总收入	<i>Income</i> 家庭年度总收入,实际数值,单位:元
		农业性收入	<i>AIncome</i> 家庭年度农业总收入,实际数值,单位:元
	社区特征	社会资本	<i>Network</i> 家庭年度人情礼金收支,实际数值,单位:元
		非正规信贷	<i>Informal F</i> 通过亲友、民间金融组织等非银行融资渠道所筹集的资金。 实际数值,单位:元

表 2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家庭创业	8719	0.1007	0.3009
普惠金融指数	8719	1.3510	0.6109
信贷可得性	8719	0.9604	0.1949
商业保险覆盖率	8719	0.2770	0.4475
电子支付使用度	8719	0.1135	0.3173
年龄	8719	51.3531	14.9989
性别	8719	0.5987	0.4901
受教育水平	8719	3.0350	4.9032
健康	8719	1.4475	0.8070
风险态度	8719	0.2123	0.4089
家庭规模	8719	3.6721	1.9816
自有住宅	8719	0.7895	0.4076
其他房产	8719	0.1642	0.3705
家庭总收入	8719	50715.5255	65072.0447
农业性收入	8719	6787.5148	29881.0244
社会资本	8719	7891.1934	22085.9423
非正规借贷	8719	8054.9034	35596.4703

(2)其他变量回归结果分析

由加入个人特征变量的模型 2 可知,农村家庭户主的年龄平方为负,表明年龄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呈“倒 U 型”,农村户主的创业意愿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与年龄相似,农村户主的教育水平高并不意味着创业意愿更高,这也与农村地区高学历人群更容易找到

合适的工作而不创业的现象相吻合;农村户主身体健康程度越高,家庭选择创业的可能性越大;在农村家庭的创业决策中,男性户主选择创业的可能性更大,但是结果不够显著,性别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占主导优势;农村户主风险偏好在创业决策中作用不显著。最后一点与张云亮等(2020)^[12]的结论不一致,可能是在农村家庭各种创业决策是家庭成员的

共同商议结果,户主个人的风险偏好作用不显著。

模型 3 是在模型 2 基础上加入家庭特征变量,由模型 3 可知。个人特征与模型 2 结论一致。农村家庭规模与家庭创业显著正相关,农村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家庭拥有的劳动力资源也更多,能够参与创业的资源也会增加;自有住宅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不显著,但是拥有自有房产外的其他房产的农村户主会有更强的创业意愿;家庭总收入对农村家庭创业的作用在 1%水平上显著,家庭自有财富水平越高,其创业可能性越大,但是农业性收入的影响不

显著。

模型 4 是在模型 3 基础上加入社区特征变量,由模型 4 可知。社区特征变量中的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和代偿非正规信贷系数均为正,对农村家庭创业起到促进作用,但促进的效果不明显,可能是由于两个变量产生的影响都是间接的。农村家庭社交的拓展有利于拓宽家庭融资渠道,同时通过民间借贷等非正规信贷方式可以更直接快速的筹措资金,有利缓解农村家庭创业资金短缺的情况,一定程度增加创业可能性。

表 3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1) <i>Enter</i>	(2) <i>Enter</i>	(3) <i>Enter</i>	(4) <i>Enter</i>
	Probit	Probit	Probit	Probit
<i>IFinance</i>	0.0890*** (0.0046)	0.08519*** (0.0051)	0.0641*** (0.0050)	0.0628*** (0.0051)
<i>Gender</i>	—	—0.0051 (0.0064)	—0.0007 (0.0063)	0.0004 (0.0063)
<i>Age</i>	—	0.0117*** (0.0017)	0.0085*** (0.0017)	0.0083*** (0.0017)
<i>Age²</i>	—	—0.0001*** (0.00002)	—0.0001*** (0.00002)	—0.0001*** (0.00001)
<i>Education</i>	—	0.0114*** (0.0023)	0.0100*** (0.0023)	0.0101*** (0.0022)
<i>Education²</i>	—	—0.007*** (0.0002)	—0.007*** (0.0002)	—0.007*** (0.0001)
<i>Health</i>	—	0.0133*** (0.0043)	0.0100** (0.0042)	0.0108** (0.0042)
<i>Risk</i>	—	—0.0074 (0.0077)	—0.0040 (0.0075)	—0.0046 (0.0075)
<i>Number</i>	—	—	0.0102*** (0.0016)	0.0099*** (0.0016)
<i>House</i>	—	—	—0.0069 (0.0084)	—0.0066 (0.0083)
<i>Property</i>	—	—	0.0356*** (0.0074)	0.0352*** (0.0074)
<i>Income</i>	—	—	0.0000004*** (0.00000004)	0.0000003*** (0.00000004)
<i>AIIncome</i>	—	—	0.0000001 (0.00000008)	0.00000007 (0.00000008)
<i>Network</i>	—	—	—	0.0000002* (0.0000001)
<i>Informal F</i>	—	—	—	0.0000004*** (0.00000007)
观测值	8719	8719	8719	8719
<i>R</i> ²	0.0649	0.0822	0.118	0.1251

注:(1)系数是估计的边际效应;(2)括号内是系数的标准误;(3)***、**、*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异质性分析

1.普惠金融发展、信贷约束与农村家庭创业

在信贷约束不同的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其进行创业的影响程度也不同。在本文中 will 受到正规银行机构借贷拒绝的家庭视为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通过此将样本分类,没有受到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为信贷可得组,赋值为 1,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视为信贷不可得组,赋值为 0。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由表 4 可知,两个回归模型系数均显著为正,均在 1%的条件下显著。有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组系数为 0.1915,没有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组的系数为 0.0927。由以上数据可知,普惠金融发展对所有的农村家庭的创业选择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尤其是

对存在信贷约束的家庭创业选择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假设二得到验证。

表 4 普惠金融发展、信贷约束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异质性分析

	有信贷约束	无信贷约束
<i>IFinance</i>	0.1915*** (0.0241)	0.0927*** (0.004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345	8374
<i>R</i> ²	0.1633	0.0719

2.保险覆盖率、家庭风险偏好与农村家庭创业

对于风险偏好不同的农村家庭,商业保险的覆盖对于其选择创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在 CFPS 调查问卷中,对受访户主进行风险测试,提问“1.直接

获得 100 元;2.扔硬币,如果结果是正面数字得 200 元,结果是反面花则什么都得不到”,将选择第一个回答的户主赋值为 0,认为其是风险厌恶型家庭,选择第二个回答的户主赋值为 1,认为其是风险偏好型家庭。根据农村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得分将样本分为全样本、风险厌恶型和风险偏好型三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知,三个回归模型系数均显著为正,全样本及风险厌恶型家庭系数在 1%的条件下显著。结合回归结果来看,风险厌恶型农村家庭的系数最大,这类家庭的保险覆盖面的变化对选择创业的影响也更显著,假设三得以支持。原因可能是,相对于风险偏好型农村家庭,风险厌恶型农村家庭对于风险变化的感知更加敏感,一旦获得商业保险的保障,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变强,选择创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

表 5 保险覆盖率、家庭风险偏好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异质性分析

	全样本	风险厌恶	风险偏好
保险覆盖率	0.12359 *** (0.0064)	0.12364 *** (0.0064)	0.1145 * (0.062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719	8614	105
R ²	0.0673	0.0676	0.0426

3. 电子支付使用度、受教育水平与农村家庭创业

由于受教育水平的不同,第三方支付的普及和发展对于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影响也存在差异。CFPS 问卷中对农村户主提问“您已完成(毕业)的最高学历是?”将受教育年限进行赋值并分类,将样

本分组为初中及以下、高中至大专、本科及以上三组。然后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

由表 6 可知,三个回归模型系数均为正值,初中及以下、高中至大专两组数据系数均在 5%的条件下显著,本科及以上系数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见识较广,能够较快地熟悉金融机构的信贷产品,同时更重视自身的信用状况,降低违约倾向,更易获得金融机构支持。所以第三方支付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增进等影响对本科及以上的高教育水平人群的创业意愿促进效果不够明显。在三组数据中第一组系数为 0.1272 明显大于其他两组,并且第三组系数明显最小,说明低学历农村家庭更能够通过第三方支付而提高创业意愿。第三方支付的普及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水平,缓解农村创业家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低学历的农村创业家庭能够接触到更多的金融产品及服务,假设四得以验证。

(三)中介效应机制分析

李成友等(2018)通过研究两省份农户家庭发现正规信贷的约束比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约束更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正规融资的扩大对农民创业的促进效果更明显^[21]。秦润秋(2021)研究发现正规融资获得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民创业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认为正规金融获得的提升可以有效增加农民的创业决策^[22]。因此,本文将“是否获得正规融资”设定为中介变量(记为 *Formal Finance*),深入分析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是如何影响农村家庭创业行为。在问卷中提取问题“除房贷外,您家是否有其他没有还清的银行贷款”,回答“是”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表 6 电子支付使用度、受教育水平与农村家庭创业的异质性分析

	初中及以下学历	高中至大专学历	本科及以上学历
电子支付使用度	0.1272 *** (0.0104)	0.0609 *** (0.0267)	0.0077 (0.0209)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7801	745	173
R ²	0.0284	0.0079	0.0047

进行正规金融融资的中介效应机制分析,结果如表 7 所示。结果显示,步骤一证明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显著,与前文结论一致;步骤二的结果在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普惠金融发展会显著影响农村家庭的正规融资获得;步骤三中,普惠金融发展与正规融资获得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

著,并且步骤三中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相较步骤一显著下降,符合中介效应的条件。由此可见,正规融资获得在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家庭创业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即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上升会促进农村家庭的正规融资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可以促进农村家庭创业。

表 7 关于正规融资获得的中介机制分析

	步骤一 因变量: <i>Enter</i>	步骤二 因变量: <i>Formal Finance</i>	步骤三 因变量: <i>Enter</i>
<i>IFinance</i>	0.5393 ^{***} (0.0281)	0.2044 ^{***} (0.0280)	0.5259 ^{***} (0.0282)
<i>Formal Finance</i>	—	—	0.2819 ^{***} (0.0561)
观测值	8719	8719	8719
<i>R</i> ²	0.0649	0.0093	0.0692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几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一通过替换模型为“Logit 模型”的方式,观察得到农村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是否创业影响系数为 0.0617,系数显著为正,与前文基本结论保持不变。检验二,将核心解释变量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替换为除房贷外未偿银行贷款,运行以上 Probit 模型,结果显示系数为正,在 1%水平上显著,与前文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除了以上两种检验方式,为了缓解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遗漏变量偏差等问题,引入工具变量“是否移动上网”进行内生性检验。“是否移动上网”是指样本农户是否使用移动设备,比如手机、平板上网,该变量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相关,与农村家庭创业无明显关系。检验结果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Wald 检验结果大于误差 10%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问题。结果与前文一致,故本文基本结论保持不变。

表 8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检验一	检验二	检验三
<i>IFinance</i>	0.0617 ^{***} (0.0050)	0.0254 ^{***} (0.0093)	1.0278 ^{***} (0.154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719	8719	8719
<i>R</i> ²	0.1230	0.0991	0.2654

五、结论

本文在普惠金融视角下,采用 2018 年 CFPS 数据,进一步从微观层面上分析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从而更深入地研究现阶段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影响的微观基础,并从信贷约束、商业保险覆盖率、电子支付使用度三个方面研究了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异质性。

具体而言,本文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第一,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家庭的创业,两

者关系具有一定稳健性。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与社区特征对于家庭创业影响具有差异化。个人特征中年龄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呈“倒 U 型”,农村户主的创业意愿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家庭特征中拥有自有房产外的其他房产的农村家庭会有更强的创业意愿、家庭自有财富水平越高创业可能性越大;社区特征中农村家庭社交及民间借贷等非正规信贷方式可以一定程度增加创业可能性。

第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区分有信贷约束和没有信贷约束的两组农村家庭,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存在信贷约束的农村家庭促进效果更显著;将样本根据农村家庭风险态度分类进行回归后发现,保险覆盖率的提高对风险厌恶型农村家庭选择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将样本按照学历水平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电子支付三方面金融服务使用度的提高对低学历农村家庭创业行为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第三,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具有中介机制效应。其中正规融资获得具有中介效应,即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家庭的正规融资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可以促进农村家庭创业。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针对提高我国农村家庭创业水平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农村家庭创业意愿。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第三方支付,健全农村地区多元化、广覆盖的金融服务体系,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风险和成本;鼓励农村地区的金融市场竞争,提高金融服务机构质量,同时将农村居民的相关信息与需求和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对接,促成金融机构开发出适应农村创业家庭的产品,促进借贷公平,创新信贷制度。

第二,完善农村保险保障体系,提高农村家庭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完善农村家庭医疗保障等惠农体系,一定程度上提高失业保险、农村家庭养老金等的数量和金额,全面提升对农村家庭的整体保障力度,

解决农村家庭创业的“后顾之忧”。

第三,提高农村家庭成员综合素质,优化农村创业环境。积极组织创新创业宣传活动和技能课程,提高农村家庭成员的文化水平和素养;鼓励农村家庭把握政策红利与投资机遇,对农村家庭的创业行为进行鼓励引导和激励政策,如降低税收、减免费用等;促进农村地区产业融合,为农村家庭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以更好地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第四,完善农村征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正规金融质量。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农户信用档案,促进政银企户之间信息的有序交换,拓宽农户获得正规融资的渠道。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应积极引进专业人才,将从业人员定期培训及考察,增强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专业素质,提高农村家庭获得正规金融支持的质量。

参考文献:

[1]陶云清,曹雨阳,张金林,等.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来自地区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证据[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1).

[2]谢文武,汪涛,俞佳根.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促进了农村创业? [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0(7).

[3]张碧琼,吴婉婷.数字普惠金融、创业与收入分配——基于中国城乡差异视角的实证研究[J].金融评论,2021(2).

[4]杜晓山.普惠性金融体系理念与农村金融改革[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6(10).

[5]朱粤伟.农村金融交易成本分析——以岳阳市农村信用社为例[J].武汉金融,2007(9).

[6]罗新雨,张林.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机制、门槛及政策价值[J].金融理论与实践,2021(2).

[7]张正平,石红玲.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基于

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8]何广文,刘甜.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户创业的金融支持研究[J].改革,2019(9).

[9]陈怡安,陈刚.社会保险与创业——基于中国微观调查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经济,2015(6).

[10]屈毅.医疗保险对农民工创业选择影响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1(3).

[11]周德水,刘一伟.“枷锁”还是“激励”? 社会保险与创业[J].科学决策,2018(6).

[12]张云亮,冯珺,赵奇锋,等.风险态度对中国城乡家庭创业的影响分析——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3 期面板数据的证据[J].财经研究,2020(3).

[13]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 ——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4).

[14]Zeng M.,Reinartz W.Beyond online search: The road to profitability [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2003(2).

[15]孙国锋,李安程,徐瑾.互联网使用、信贷获得和家庭创业——基于城乡差异视角[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10).

[16]翁辰,张兵.信贷约束对中国农村家庭创业选择的影响——基于CHFS 调查数据[J].经济科学,2015(6).

[17]Sarma M.,Pais J.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11(5).

[18]Sarma M.Measuring financial inclusion using multidimensional data [J].World Economics,2016(1).

[19]杨博,张楠.陕西省流动人口健康知识水平与影响因素——基于健康资源供给的多层模型研究[J].西北人口,2018(6).

[20]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8).

[21]李成友,孙涛.渠道信贷约束、非正规金融与农户福利水平[J].改革,2018(10).

[22]秦润秋.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决策的影响[J].山西农经,2021(21).

责任编辑 刘玉成 E-mail:770533213@qq.com